

2013

融安文史



第四辑

融安文史编辑委员会

主 编：韦炳安

副 主 编：韦启科

责任编辑：廖秋元

编 委：吴志雄

蒋耀芳

目 录

晚清至民国二十五年长安教育概况	秦太余 (1)
解放前长安中学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斗争	罗祖光 (6)
我所知道的“施孤坟”和民国二十四年前后 的长安一小	秦太余 (12)
融安县民国时期的农业生产	潘介平 (15)
解放前长安木材市场见闻	李品光 (21)
融安县罗汉果生产简介	潘介平 (23)
血战桂林城	覃泽文 苏秀珂 (26)
古镇长安沦陷记	莫炳福 (41)
在桂林抗日战役殉国的长安青年李济时	吴志雄 (43)
叛徒叶振南的下场	莫炳福 (46)
匪徒在温良村上的暴行	郭志贤 (48)
雅瑶区府保卫战	黄爱邦 (53)
中金一战	吴祖介 (57)
山贝突围	黄爱邦 (60)
建设枝柳铁路纪实	邱永先 (65)
长安大桥修建碑亭及撰写碑文始末	胡定铭 (70)
融安泗维河水库	罗太科 (73)
圣山庙今昔	秦太余 (80)
古镇长安四大天王之一——广隆兴	李品光 (86)
我所知道的长安妓院	罗庆培 (89)
古壤山惨案	秦太余 (93)

晚清至民国廿五年 长安教育概况

秦太余

—

晚清光绪三十一年以前的教育概况与科举制度：

清末光绪三十一年以前（以后废科举，兴学堂——见《融县志》①、《辞原》、《清史要略》）的教育制度，是沿着清初一贯的“科举制度”的。当时的教育方式是放任式教育（以下详述），和现代的学校分科目、有层次的督促强制式的做法完全不同。它是以六经四子书为主要科目，其内涵主要是为帝王统治人民而服务的旧伦理道德，是孔、孟学说的教条主义，要死记硬背。除习作“八股”文章外，兼要学会作对联、诗、赋。所谓“八股文”，是做一篇文章要分为八段，每两段的内容要相互对比（相似于对联的对比，但内涵要比对联复杂得多，不须平仄相对），再加上篇首的“破题”、“承题”两段而成。专制皇朝就是用这些东西来限制、束缚人民的思想，愚弄当时的知识分子。读书人经过层层政府官吏的考试（主要作八股论文），谁考得好就中选，“得功名”（学历资格），就可以作官，成为封建皇朝统治人民的工具。

清代的放任式教育，可分为私学和公学两类：

私学又分为蒙馆和经馆（两种都称为私塾）。

（一）蒙馆——小孩在七至十二岁期间，由父母请来有教学名望的人做老师（旧时叫先生）在某家开馆，教小孩识字、习写毛笔字、背诵启蒙书籍如“三字经”、“千字文”等，最多背诵到《四子书》、《幼学琼林》等。请先生教馆的主人称为东家，教馆的先生称为西席或西宾。东家供给先生食、宿和教室（旧称书房），每年奉送“束脩”（即用谷、米、银钱为学费）若干。同时招来其他需读书的儿童若干户，各送儿童来合成一馆十余至三四十学生不等。各学生家每年各送束脩若干（比东家略少）。逢年过节（指旧历大年、端午、中秋、重阳节），东家及各户都要送节礼（红包、粽子、月饼、鸡、鸭不等）。也有绅士们在自己家中设馆帐授徒的，由各学生家送束脩及年节礼。

（二）经馆——是学识比较高深的人当先生，教十二岁以上至二十岁上下的学生，讲授四子六经古代史籍，教作八股文、对联、诗、赋。学成后可以去应考政府制定的“科举”。此种经馆有东家延聘西宾的，也有自行在家设帐授徒的。各学生奉送的束脩礼品如上面蒙馆所述。学生结婚时，要请先生吃酒，先生必须写好一付精裱好的大红挂联往贺，如有考中科举（秀才、举人、进士等）的学生，要送礼品谢先生，先生要回拜致贺。

公学也有两种：

（一）书院——由政府（县、州、府、省）出资提供房舍，供养“山长”（书院教师），来接受教育的学生免费（束脩），只自备伙食和书籍，来去自由。

（二）义学——由地方人士捐资及房舍，供应先生（教

师)食、宿、书房，来就读的子弟免费。

可是当时融县公款办书院或地方集资办义学，都处于世乱、天灾，民穷财尽，经费极有限，只能供养教师一人，房舍也受限制，收容学生至多三四十人，而且教学时间俱不长久，据《融县志》所载，各书院、义学办后不久就夭折了。

科举概况：

清代的教育已如上述，受过上述教育的人，即经蒙馆或经馆、义学、书院学习过的人，有了一定的学识后，于是满清政府就用“科举”制度来笼络他们，即由各级政府的管学官吏通过“开科考试”录取人才。其办法是自下而上，首先是县一级设有祀孔子的学宫(后来人们把它叫为红庙或文庙)，又名黉学。学宫内东、西两侧设有两个“学官”的官署，东边(左边)是正学官，称为“教谕”；西边(右边)为副学官，称为“训导”。通过一年一次的考试，考中的(合格被录取)叫入学，又称“童生”或“县学生”(不管年龄大小，有些童生是满头白发的老人，因为这些人迷恋“功名”，一考再考都还想考，许多老死还未中“秀才”)。童生定期到府应考，考中的称为“附生”，附生成绩优等的称为“增生”，增生再经考成绩优等的称为“廪生”(廪者，谷仓也，此指国家仓库。廪生每年由县给仓谷数百斤或白银数两)。附生、增生、廪生俱称为秀才，当时在公文、文书上写为“邑庠生”和“邑廪生”，邑，指县和州、府，庠是学校(当时的老百姓见官要下跪磕头，秀才就不用了，只打躬作揖称县、府官为老师大人即可，以示尊重有功名的读书人)。

县和府再上一级是省，称为乡，秀才到省应考，称为乡

试（普通三年举行一次，叫做一科，有时皇帝心血来潮，另开特科、恩科是例外）。考中的称为举人。还有一种由省从各县遴选出一定名额才学优异的秀才，贡荐给朝廷，称为贡生，即是乡贡、贡士；贡生又分为优贡、拔贡、恩贡、岁贡、副贡。

举人、贡生都可以应皇朝在首都三年一科的考试，先在首都礼部会试，中试后再到皇帝殿前去殿试，被录取后称为“进士”（进士分三甲：第一甲三名，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探花，第三名榜眼；第二甲若干名；第三甲若干名。第一甲称为“赐进士及第”，第二甲称为“赐进士出身”，第三甲称为“赐同进士出身”，把名次写在黄纸的“榜”上公布，人们称为“金榜题名”或“黄榜登科”）。乡试第一名称“经魁”和“解元”，会试第一名称“会元”，殿试第一名称“状元”，连中三元称“三元及第”。

二

清末“兴”“义学”、“两等小学”及民国“北区区立小学”概况：

清末，长安属于融县长安镇（当时融县区分为四大镇：北曰长安镇，南曰清流镇，东曰思管镇，西曰鹅颈镇《融县志》），那时长安镇的士绅们，鉴于光绪十三年，融县城及水东团设立“义学”，早已酝酿“兴”（办）“义学”，以补救长安一带（后来的北区）的失学青年。于是士绅富商们集资准备兴办义学，但房舍、教师、束脩等的来源一时未能圆满解决，加之当时世乱，走兵避匪，惶惶不可终日，只筹备了部份田、地和资而悬搁下来，因而“兴”“义学”未能

实现。光绪三十一年，清廷明令废科举立学堂，地方有识之士亦认为不办学堂，地方子弟读书没有出头日子。但当时的融县是山区边远闭塞之邑，官、绅保守观望，尚未行动起来办学堂；长安又僻处北隅，唯县城官、绅之马首是瞻，亦未敢轻举妄动。直至光绪三十三年，清廷一再严饬层层府、厅、县必办学堂，融县县令赵邦泽已在县城火急督办学堂（见《融县志》）。于是长安的团局、士绅奉饬令后，才将原来已筹募“兴”“义学”之田、地、款银，于光绪三十三年秋兴建“长安两等小学堂”，地址由某会馆捐献坐落于湖广街口、泗山庙东边大畜地处（此段经历曾闻自罗长卿举人与罗正真两前辈谈及），民国元年后改为“北区区立小学”，並经多位校长扩建，规模比其他小学宏大。当时的学生俱是男生。至民国十年后，又在泗山庙后面一块义学地建立女校，是为“北区区立女子小学”。女校校门在男校与泗山庙之间，两边高墙，中间一条宽大巷道进入女校，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上半年男校与女校合并^②，民国二十五年正是搞三位一体，该校改名为“长安镇中心国民基础学校”。

注：1. 本文所称《融县志》系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出版的。

2.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上半年，男校与女校合并，校长是罗祖光，据罗亲述是奉县令合并的。（参阅《融县志》第三篇115—116页）

解放前长安中学 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斗争

罗祖光

解放前的长安中学，即今融安高中的前身，创办于1942年，跨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迄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经历潘明澜、魏鼎勋、曾梅先、肖若松四任校长。解放前的七年是充分反映了校内外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互相较量和斗争的七年。在校内，有进步师生同顽固分子的搏斗；在校外，有中共地下党同志的不尽关怀和私立时期一部分贪污腐化顽固透顶的校董对这间学校的横加干涉，反动派对师生进步活动的压制，明争暗斗是相当激烈的。

第一任校长潘明澜是一位好校长，他勤勤恳恳，艰苦创业，延揽来了一批进步教师，和他们同心同德创办学校。他聘来的教师有1927年的老共产党员（上海左翼文艺团体太阳社创办人和领导成员之一、上海中共党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老作家）孟超，有中共地下党久经考验的作家况剑萍（又名华嘉），有外地转来的地下党员陈子明（陈光）、黄焕秋、唐紫菱、何委明等，此外还有一些靠拢党的进步教师。这些教师和潘明澜校长一道，按照毛主

席“学校要造就大批为民族和社会解放的人”的指示，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对国民党的学校教育工作进行改造。如孟超老师，对教材和他选用补充的教材，作了许多进步的解释。况剑萍老师领导学生演了好些进步戏剧，其中主要均有著名戏剧作家曹禺的《雷雨》和《日出》。音乐教师唐紫菱教学生唱《渔光曲》、《毕业歌》，还有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聂耳的《开路先锋》等。历史课的老师讲社会发展史。地理老师讲到东欧人民共和国时，对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阶级构成加以具体说明。这些内容都是国民党的课本中没有的。老师还介绍进步书籍给学生们看，学生受到影响，提高了认识，自动组织抗日宣传队到大将、板榄、黄金一带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同时，还与黑暗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在潘明澜任内，长安中学属于地方私立，设校董会掌管，一些贪污腐化的校董诬说老师不收卷，克扣教师工资，贪污建校财物，学生包围了校董会议室，高喊“打倒坏校董”的口号。而且不少学生参加到地下党领导的活动中去搞地下工作，打游击，从事改造社会的实际斗争。如一二合班的黄翠松、覃冠群，三四合班的李希康，第五班的杨文贵，六七合班的龙漪澜，后来都成为柳北游击队的重要骨干。

但是潘明澜和进步教师的进步办学思想，却引起部分反动校董特别是江浩和江云渠的不满，江浩贪污学校大量财物被师生反对而不满，江云渠几次想插足到校内搞特务活动都被拒绝，因此也不满。于是二人勾结起来，在校董会中大说长中赤化，要开除潘明澜和赤化教师，但又拿不出证据。于是在1944年春季学期快要结束时，以学校无钱继续办学为由，通知潘明澜等另谋出路。学生知道后立即采取行动，贴

出“打到江浩！”、“把江浩开除出校董会”的标语，开展罢课斗争。然而，学校是私立的，校董会权力大过一切，最后，潘明澜和一部分进步教师终于被逼走，到龙妙办四维中学去了。

二

潘明澜走后，魏鼎勋接任校长，魏也聘来几位好教师，如孟超、庄寿慈、韩北屏等，他们都是当时的进步作家、诗人和科学家。不久（1944年11月），日寇侵犯长安，学校停课解散。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秋季学校复课。当时国统区掀起了进步教育运动，要求改造国民党教育内容，学校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教师们介绍了许多进步书籍给学生课外阅读；有些班级还组织图书库，开展读书小组活动，开展歌咏比赛、戏剧比赛、演讲比赛。音乐老师伍耿荣、张少云在课间教学生唱进步歌曲，组织歌咏队开展业余活动，教唱《五块钱》、《古怪歌》、《茶馆小调》……等揭露、讽刺国民党反动派反动面目的革命歌曲。如《五块钱》中有“这年头怎么得了，五块钱的钞票无人要……只因为，钞票印得多，物价就涨得高，柴米油盐天天涨哟……穷人吃不饱，富人哈哈笑……快把世界来改造。”教导主任黄福祥还在歌咏队中讲述冼星海、马可等进步音乐家在延安的活动情况。戏剧比赛对外公演《裙带风》、《打渔杀家》、《越打越肥》等剧，以揭露官僚资产阶级的丑恶嘴脸。演讲比赛讲“全世界民主力量和法西斯力量的对比”、“民主与反民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等题。老师还在学生中组织文艺研究会，印发革命文艺团体中华全国文艺作家协会《第二届五四文艺节

告全国文艺工作者》这篇纲领性的战斗檄文。虽然后来文艺研究会遭到破坏，但这篇檄文却提高了同学们的认识，使学生更善于分辨出真善美与假丑恶。

各班班会和师生个人还订阅香港版《大公报》，该报充分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现象，详尽介绍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同学们以此报为基础按班定期开展读报读书活动。这些活动都得到魏鼎勋校长允许，一直开展到他离开学校为止。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从正反两方面他所表现的态度来看，可算是一位开明的校长。魏还做了一件好事，在他任内他极力活动将学校改为公办，于1946年初，长中改为公办，终止了校董会中土豪劣绅反动势力对这间学校的干扰。后来由于柳州完中校长黄公健（是魏读桂林高中时的老校长，魏是黄的得意门生）邀魏去柳州任教导主任，魏应邀于1946年上半年离开长中。

三

魏去后，由曾梅先接应，他到校后首要措施是安插亲信。引用贺县人陈科汉为军训教官，黄俊达为童军队长，岑立岳为教导主任，作为他的左右手。撤换一大批班主任，改派他的贺县学生充任，连图书馆理员都由贺县带来。由于图书馆是他的亲信掌管，《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复本在图书馆里竟达百册以上。此书是蒋介石亲手写的一本反共书籍，书中贯彻蒋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思想。在日本侵略大军跨入国境，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的时候，还谈什么“中国今后的命运全在内政。”公开声言要反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把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抛到九霄云外），大量贩卖封建主

义和法西斯主义毒素。诬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扬言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这样的一本书，曾梅先竟然在国民党上层教育领导机关无规定的情况下，私自限令每个学生人手一册。

曾到校之初，发现老师学生看《群众杂志》、《新华日报》，即向读者提出警告：“我们在贺县早都不许看这些书了。”

他到校的第二个学期即下令禁止歌咏比赛、演讲比赛和戏剧比赛，解散歌咏队，他对一些进步教师发威说：“你们这样搞，我这个校长还要不要当？”提出一套什么“数学比赛”、“英语比赛”、“宿舍整洁比赛”没有政治内容的东西来取而代之。

然后，又口头明令禁止各班师生订阅香港版《大公报》。还在各班安插小侦探，侦察老师和学生的思想行动，定期汇报。还制定出一套汇报密码以备不能口头汇报时作出书面汇报之用。

在校外，他强令全校师生到二十里以内的圩镇和农村，将红七军写在墙壁上的标语，以及抗日时期疏散过境的革命团体、师生留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标语，全部铲掉，换以“勘乱建国”之类的标语。学生平时从未见过这些标语，此刻见时，感到很新奇，都悄悄地把它记录下来。如红七军的一条标语：“红军是工农革命的先锋队。”不少学生是工农家庭出身，他们亲眼见过大地主大老板在他们的家长面前作威作福。看了这条标语，对红军产生了无限的敬仰。

曾梅先虽然对进步教师、学生不断地进行监视警告。但仍然无法阻止革命师生的进步思想。这些进步师生，如：黄

生民、肖泽昌、肖若松、叶永蓁、黄贵祥、陈鸣……等，非但不屈服，却想出新的办法，纷纷集资和借款购买进步书籍，从当时的“新华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购入公开半公开发行的《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入门》、《社会科学二十讲》、《社会发展史》等进步书籍。每班组织图书库，建立读书会。音乐教师杨钦华教学生唱《顿河上的向日葵》，并对歌词做了精辟的解释，对当地社会主义的苏联的社会制度和人民生活作了扼要的介绍，借以阐述苏联十月革命的意义，引导学生追求光明。

融安地区地下党的莫可量、覃泰恩同志经常给长中教师出主意，想办法，指点方向。莫可量同志还在长中学生中发展“爱国会”会员，召集长中的进步学生到西隅小学去开展礼拜日活动。由于受进步思想影响，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学生有五、六十人之众，解放初参军参干的达两百人以上，有好些学生还瞒着家长和学校深更半夜翻越校墙去投奔解放军。

1949年9月，曾梅先死后，肖若松接任校长。肖任职虽然为时十分短暂，但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当时解放大军南下逼近广西，学校当局配合解放大军解放长安，派两名教师与柳北游击队第六大队联系，后按大队指示，动员全体师生投入保护仓库、银行、桥梁、道路……等，防止敌人破坏，协助政府接管学校。长安解放时，学校不停课，不疏散，全体师生列队到大街上迎接解放大军。同时不少学生参加了时方文工团，参军参干的不计其数，有的还担任了县以上的领导工作。长安中学无愧于后人，是一所有光辉历史的学校。

我所知道的“施孤坟”和民国 二十四年前后的长安一小

秦太余

现今长安镇解放街街口以西至大巷乡以东的大榕树一带地段，据老一辈人和居住在这里的老住户说，前半世纪这一地段居民稀疏，百年前更是荒无人烟，是一片坟场畜地。中间是一条乡村村民进入湖广街（今解放街）到长安赶圩的大路，南面有一福建同乡会馆大院（解放初期人民法院设于此处，后拆除），早时，福建同乡们用会馆公款在这一地段买地一块，给那些鳏寡孤独的同乡死后作丛葬坟场地。

每逢中元令节（每年农历十四、十五日），人们除祭祀自己的祖先（一般白天在家里祭祀，杀鸡宰鸭，烧化纸钱、纸衫、纸屋、纸鞋、纸帽、冥镪等）外，初更黑夜，还要到外面旷野或路边燃香烧纸、泼水饭来施舍给那些无人祭祀的“孤魂野鬼”，称为“施孤”。

这一地段处在大巷进入长安的大路边，又是半旷野的丛葬坟场地，于是长安湖广街（今解放街）的人家集中在路的西边施孤，大巷村十字路一带的人家集中在路的东边施孤。每年农历七月十四、十五之夜，这里便辉煌烛火，袅袅香烟，纸灰飞扬，声声鞭炮，别是一番独特的夜景，“施孤坟”即由此而得名的。

长安一小是融安县历史悠久的老学校，它的前身是光绪三十三年秋兴建的“长安两等小学堂”，校址座落于湖广街（现在的解放街）口泗山庙东边的大畲地处。民国元年以后改名为“北区区立小学”，并经多位校长扩建，规模较其他小学宏大。当时的学生俱是男生。民国十年后，又于泗山庙后面一块义学地建立女校，是为“北区区立女子小学”。女校校门在男校与泗山庙之间，两边是高墙，中间一条宽大巷道进入女校。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上半年，女校与男校合并^①，民国二十五年实行三位一体（长安因特殊情况，延至1936年方实行三位一体），该校改名为“长安镇中心国民基础学校”。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改名“长安镇表证中心国民基础学校”。长安解放后，更名为“长安镇小学”，1953年更名为“长安第一小学”。

现将从清代两等小学至北区区立小学学校历任校长及教师任期时间列表如下：

时 间	校 名	姓 名(校长)	姓 名(教师)
清光绪33年至宣统3年	长安两等小学	秦守仁(槐卿)	陆介姐
民国元年至民国六年 (1912—1917)	北区区立小学	江蕴琼(佩卿)	罗正真、卢某
民国七年至民国九年 (1918—1920)	北区区立小学	罗正真(静尘)	江蕴琼、黄某
民国十年至民国十四年 (1921—1925)	北区区立小学	秦渥(宝渠)	黄耀甫、黄子光、毛择三
民国十五年至民国十九年 (1926—1930)	北区区立小学	黄耀甫	黄耀轩、黄耀邦、黄子光、易、容、易、梁、黄耀轩、秦渥、容易、梁、黄耀轩、黄耀邦、黄耀轩、黄耀邦、黄耀邦、黄耀邦
民国二十年 (1931)	北区区立小学	蒋日晟	
民国廿一年至民国廿二年 (1932—1933)	北区区立小学	黄耀甫	
民国廿二年至民国廿四年 上半年(1933—1935)	北区区立小学	黄治邦	
民国廿四年下半年 (1935)	北区区立小学	罗祖光	
民国廿四年下半年 (1935)	北区区立小学	黄治邦	
民国廿五年上长年 (1936)	北区区立小学	黄治邦	

注：①1935年上半年，校长是罗祖光，据他亲述是奉县令合并的(参阅《融县志》第三编115—116页，亦符合)